



曾纪鑫
读解中国历史系列

历史的刀锋

11个人的中国史



历史的刀锋

11个人的中国史

曾纪鑫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的刀锋：11个人的中国史 / 曾纪鑫著。
--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5108-3426-4

I. ①历… II. ①曾… III. ①中国历史—通俗读物
IV. ①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3910号

历史的刀锋：11个人的中国史

作 者 曾纪鑫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版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19.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3426-4
定 价 3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楔子：被“上帝”选中的“代言人” / 1

周文王：传统文化的“上帝之手” / 5

周文王的事业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兴周灭商，二为创作《周易》。而这两个部分又是那样的密不可分，它们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贯串于他生命的始终。

吕不韦：玩弄“上帝骰子”的千古奇商 / 33

吕不韦的一生，大起大落，机关算尽，保持了商人的本色。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在他人生的任何阶段见到人性的可贵。

秦始皇：奠定专制皇权的铁血之王 / 65

秦始皇嬴政以他五十岁的个体生命，支撑起一个存在只有十五年的短命王朝，却改变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古代历史。

刘邦：流氓皇帝的历史烙印 /95

刘邦的怀柔与流氓手段不仅成为后世帝王的典范，也使得中华民族的阳刚之气、高贵之风、磊落胸怀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

董仲舒：万马齐喑的始作俑者 /123

董仲舒努力使得思想归于一统，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政治干预学术的恶习，战国时期那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成为文人志士们只可缅怀的“绝响”。

曹操：面对历史的双重改变 /147

曹操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无畏气概，任人斥责唾骂地充当奸邪恶毒的化身，潜在而曲折地继续改变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土壤。

拓跋宏：民族融合的自觉先行代表 /173

拓跋宏在一千五百多年前严厉推行的全盘汉化政策，正是一种顺应历史潮流与发展趋势的伟大改革。他那认同先进文化的豪举成为了后来人的典范。

唐太宗：走向皇权人治的盛世之巅 /199

唐太宗开创了皇权盛世与传统人治的巅峰，既为中国人留下了遥远的理想社会梦境，同时也该让后人认识到，该换种“活法”了。

赵匡胤：不胜重负的黄袍加身 /227

赵匡胤黄袍加身是中华传统谋略的一次杰出典范，阴柔，是其内在本质。这一特性影响开来，有宋一代差不多被阴柔与谋略浸泡得面目全非。

朱元璋：狭隘变态的农民皇帝 /251

朱元璋将全国视为一个扩大的农村，用管理农业的手段治理国家，将整个中国农业化，攥住了已然前进的历史车轮，使得中国社会更加凝固不变、停滞不前。

吴三桂：举足轻重的历史砝码 /279

吴三桂的才能、胆识、个性也注定了他只能是一颗砝码。而一旦砝码选择了倾斜的方向，历史已成定局，即使翻悔，也无回天之力。

在对“上帝”不敬的罪行上犯了滔天大罪，但好在上帝是仁慈的，他给了你一个悔过的机会，让你去完成一项伟大的使命。上帝说：“我派你去埃及，去见法老，告诉他：‘以色列人是我的子民，他们要出去自由地生活。’”你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但你并不知道，你将因此而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可能失去生命。你来到了埃及，见到了法老，但法老并不愿意放走以色列人。于是你便开始领导以色列人逃往红海。在逃亡的过程中，你们遇到了许多困难，但你始终没有放弃。终于，在红海上，你们遇到了一艘船，船长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帮助你们渡过了红海。你们顺利地到达了迦南，但你们的领袖却在途中病倒了。他知道自己即将离世，便把他的权杖交给了摩西。摩西成为了以色列人的新领袖，带领他们继续前行。

楔子： 被“上帝”选中的“代言人”

历史，虽然是一些曾经发生过的往事，早已随风而逝，烟消云散，但对今天生活着的每一鲜活的个体生命而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影响。

人类并非从天而降，凭空而生，而是从远古一步步地发展进化而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历史上每一个重大事件，每一次重要转折，无论多么久远，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或浓或淡、或隐或显地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刻下了一定的烙印。历史就像一条肉眼看不见的绵绵长河，不管我们承认与否，总之是从呱呱坠地的那一时刻起，便“身不由己”地跌入其中、陷入其中、融入其中了。

历史“活”在我们置身的现实之中，现实便是历史的浓缩与延伸。历史积淀的成果是文化，文化赋予人类语言、习俗、信仰、工具等方面的行为方式与生活内容。也就是说，我们从历史脱胎而来，自第一声长啼开始，就有一双看不见的“上帝之手”在某种程度上规范了我们的人生。因此，那已然消逝的每一历史阶段，都包蕴着相当密集而丰富的信息与内涵，这

些信息与内涵对于我们今天的价值与意义，无论怎么形容都不过分。鲁迅先生就曾经说过：“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

尽管已经发生的一切无可更移，尽管历史的影响相当深远，但并不等于我们只能戴着沉重的镣铐在历史的阴影与宿命下蹒跚起舞，而是可以充分发挥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与内在潜力，以史为鉴，创造超越往昔的新的历史。于是，正确地认识历史，对今天生活着的我们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人们谈论历史时，常免不了提出多种假设：要是没有某某人物出现，要是没有某某事件发生，要是历史朝另一个方向稍微一拐，那么，我们今天的现实会是一番怎样的光景呢？

其实，这种种假设，便是历史的偶然性。历史偶然往往通过某些代言人予以体现，这些代言人便是人类的强者，历史的弄潮儿——伟人、英雄与豪杰。

透过纷繁驳杂的偶然表面，在历史的内里，又分明贯穿着一条清晰可现的脉络，一种颇富意味的规律——这便是历史的必然！

偶然与必然相互结合，历史才显出它的汪洋恣肆与斑斓多彩。

基于以上认识，我开始了《历史的刀锋：11个人的中国史》一书的构思与创作。

对卷帙浩繁的中国古代史史料经过一番爬梳剔抉，我从“改变历史”这一角度，选取了十一位对中国哲学、思想、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等方面产生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巨大影响的典型人物：周文王、吕不韦、秦始皇、刘邦、董仲舒、曹操、拓跋宏、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吴三桂。在我眼里，他们都是一些被“上帝”选中的“代言人”，那大音稀声、大象无形的上帝正是通过他们拨动了历史的转盘，不仅决定了民族的命运，改变着历史的昨天与今天，还将继续影响中国的前途与未来。

我将选取的十一位历史人物还原于当时复杂纷纭的历史舞台，置放在整个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与广阔的历史空间，以当代全新意识，对他们的时代背景、生长环境、独特经历、复杂心态、人格力量、智慧经验、功过

是非、历史影响等进行观照比较、透视研究。

这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相当艰巨的工作，不仅需要翻阅、研读、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还得拥有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等多学科多领域的丰富知识才行；除了纵向描述外，还得进行横向的中西比较；而最关键的是，这些代言人大多都是中国历史上如雷贯耳的顶尖级人物，他们的行止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好些都耳熟能详，我非但不能重复前人的话语，更得有超越他人的独特描述与深刻感悟才是。

我选取十一位古代历史人物，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叙述这些显赫的历史个体，而是以他们为载体，对中国历史进行方方面面的描写与反思。

我以周文王及其推演的《周易》为本，探讨中国文化之源，正是一册薄薄的《周易》，改变了古代文化发展轨迹，影响了我们今天的文化基质；以秦始皇为线索，侧重于他对中国皇权专制政体的奠定与作用；以刘邦的胜利说开，状写其流氓行径及怀柔政策上升为民族的主流话语后对国民性的改造；从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入手，论述文化专制如何与政治专制合谋，对民族激情、活力、智慧、创造的残酷扼杀；以孝文帝拓跋宏的主动接受中原先进文化为契机，论述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及中华民族那令人肃然生畏的内在同化力与凝聚力，即使世界上最富特色、最难同化的吉普赛人与犹太人，也能使他们如落入沙漠的雨滴般与汉族农耕文化融为一体；通过唐太宗“贞观之治”这一皇权人治盛世之巅的描述，探讨中国的土壤能否自发诞生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外来的法治之苗能否移植成活长成参天大树；从宋太祖赵匡胤由黄袍加身登上皇位的不胜重负展开笔触，追寻北宋军事何以一误再误，并导致中原从此积贫积弱，成为少数民族逐鹿的广阔战场；以农民皇帝朱元璋的狭隘变态为由，写他如何用管理农业的方法治理国家，遏制商品经济之苗，将整个中国农业化，使得古代社会更加凝固不变、停滞不前，与同时期的西方形成鲜明对比……

偶然在历史进程中固然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由环境、气候、种族、时代所决定的历史必然性像一条红线，总是那么突出地贯穿于古今历史之

中，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地呈螺旋状态势向前行进。中华文明在一个相当封闭的环境中自我发展，形成独具一格的亚细亚文明系统，与以古希腊为源的西方文明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其优劣得失，也在古今、中西间的纵横比较中展现在读者面前。

在具体创作时，我尽可能地以西来的启蒙思想为参照，将历史与现实联系在一起，打通文、史、哲之间的联系与通道：以历史与历史人物为载体，用哲学的思维审视反思，以文学的方式描摹再现，熔历史的厚重、文学的灵动、哲学的思考为一炉。

《历史的刀锋》不是学术论著，它是一部雅俗共赏的系列文化历史散文集，适合于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水平稍低的读者可以了解历史人物、历史故事，获得一定的中国古代历史知识；文化较高的读者则可领悟蕴涵其中的思想，对中国历史怎样一步步从远古走到今天，神秘莫测的“上帝之手”如何拨动历史的转盘，从而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命运等重大命题，获得较为明晰的认识与启发。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历史的转盘在一双看不见的“上帝之手”的操纵下，通过一个个走马灯似的“英雄”不断地拨动着旋转不已，一直转到了今天。天翻地覆的政治事件、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早就化为股股云烟飘散、消失在历史深处，犹如一道道流血的巨创，再大也可被时间缝合、痊愈。巨创不再，但伤疤永存。这疤痕就是代代积淀、凝聚而成的传统文化，它们形成一种民族潜意识、集体无意识不断地作用于历史、影响到今天，无声无息却又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地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个人信仰之中。

回望历史是为了活得更加清醒，研究历史是为了变被动人生为主动“出击”，反思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创造未来。如果有一天，历史的发展规律与客观必然全在人类的认识与掌握之中，从而择优选取最佳时间、最佳人物、最佳途径等机动、可变的偶然因素，按照人们认可的理想模式加以改变、创造，那时的人类社会，当是一番怎样的光明与灿烂？

周文王的事业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兴周灭商，二为创作《周易》。而这两个部分又是那样的密不可分，它们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贯串于他生命的始终。

周文王：传统文化的“上帝之手”

《易经》，一般称为《周易》。《周易》之名，最早见于《左传》一书。至西汉时，儒家学派将《周易》、《诗》、《书》、《礼》、《乐》、《春秋》等著作奉为经典，名曰“六经”，《周易》这才被称作《易经》。

《周易》一书到底成于何时？对此，《周易大传》曾以一种把握不定的疑虑口吻写道：“《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邪？”迄今为止，学术界虽然尚未得出一个无可置疑的肯定结论，但大都认为该书成于三千多年前的殷商之际或之前。

那么，作者又是谁呢？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历来就有所谓伏羲画八卦，文王演六十四卦之说。《史记》作者司马迁也认为《周易》的作者就是周文王，他在《报任安书》一文中曾写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之语。西伯，也就是周文王，因其为商朝末年西方强大的方伯之国周族领袖，

故称西伯。当然，也有人因为《周易》六十四卦的爻辞中记有周文王之后的史事而提出质疑，认为卦爻为周文王推演，而辞文出自周公或他人之手。其实，像《周易》这样的经典之作，其成书难以一蹴而就，肯定得有一个从雏形到充实、完善的漫长历程，必须经过多人乃至数代人的构思、采辑、撰写、订正、增补与润色才有可能形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周易》文本。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肯定作者就是周文王一人，但我们至少可以推断，周文王在《周易》成书的过程中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六经之首的《易经》，在我心中一直是部望而生畏的皇皇大著。它像一处深不见底的黑洞：错综复杂的卦爻符号令人眼花缭乱、简略古朴的文言语汇几乎不知所云、枯燥艰深的哲学内蕴密码般难以破译、包罗万象的繁复别致一时无从言明……《易经》以一套古奥艰涩的话语系统，向我们诉说、展示的是一个遥远、朦胧而游移的陌生世界。

它像一个环环相扣的巨大迷宫：这里，既有远古的愚昧与浅稚，也有文明的智慧与深邃；既有僵化腐朽的文化因子，也有现代科学的朗朗光照；既有天人合一的融融交响，也有焦虑矛盾的痛苦撕扯；既有唯物的辩证，也有唯心的神秘；既有恬淡幽静、舒缓寂寞的小桥流水，也有惊涛拍岸、一泻千里的长江大河……《易经》将这些既矛盾又统一、既复杂又简单、既绚丽又平淡、既古朴又现代的对立熔于一炉，总是搅得我们晕头转脑，无法理出一个了然于胸的明晰世界。

它像一座庞大的综合知识宝库：组成《易经》的“硬件”，即原有的文字与符号并不多，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就可全部囊括，然而，它却集中国古代天理、命理、圣理、数理、哲理、心理、文理于一炉，举凡哲学、史学、数学、美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生物学、生态学、经济学、文字学、符号学、伦理学、文艺学等多层次的自然社会学科，似乎无所不容。诚如《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所言：“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

它像一个硕大无朋的“空筐”：《易经》除了它本身固有的惊人容量外，

人们还可将大千世界一些新的发现与发明、认识与解说等各式形形色色的东西装入其中，它也就像一个神奇的魔筐，似乎什么东西都可容纳得了，消化得了，解释得通。

哦，《易经》，这是怎样的一部大书、奇书、异书呵！

我第一次接触《易经》，除了陌生茫然，更多的是无所适从。我不知怎样来阅读它、理解它、破译它，只有借助注家们的解释与诠说。看得多了，注家们不仅大同小异，更多的则是自己都没弄懂就来装模作样地指手画脚，还有的则是自己钻了牛角尖走入迷潭进了死胡同之后又来误导读者。

要想深刻地认识理解某一事物，抵达本质进入胜景，除了前期必要的引导外，更多的则靠自己的执着追求、艰苦努力与不懈探索。研习《易经》更是如此，作为一部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与文化智慧综合宝库的神秘主义代表作品，除了常规的分析拆解，逐一串通外，更得依靠个人的灵气与悟性予以总体把握。阅读《易经》，得摒弃浮躁的心态，入静入定，细细地揣摩、咀嚼、品味，慢慢进入《易经》那一个个古奥文字所营造的独特氛围与神秘的强力“气场”之中，与它展开喁喁对话。由遥远而贴近，由陌生而熟悉，由神秘而理解，由深入而亲切，于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心态才有可能产生摩擦、对撞与交融，进而迸射出耀眼的火花，激荡出一个光彩夺目的灿烂世界。

十多年来，我不知捧读过多少个不同版本、不同注家的《易经》，有时，我似乎窥其堂奥，进入了它的深层内里；有时，我觉得还在它的外围兜圈子，只抓住了一些微不足道的皮毛；有时，我恍惚间与它融为一体，天上人间，遨游八极；有时，我又感觉着自己与它是两套相互拒斥的不同系统，无法认同那容纳其中、附着其上的杂质……就是这样一本薄薄的小书，它那独特的文化品格与精神气质磁铁般牢牢地吸附着你，它促你潜心思考、探赜索隐，它使你流连忘返、乐此不疲，它时而让你感到陌生神秘、茫然窘迫，时而又让你豁然贯通、惊喜莫名。

越是深入其中，你就越觉得《易经》实在是太博大、太艰深、太古奥了。自古至今，历代儒生皓首穷经，读《易》不辍，注家不下千余，留传下来的论著大约三千多种，几乎每年就有一种问世。据《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晚年喜《易》，“韦编三绝”，勤奋苦读而至编连竹简的绳子都断了多次。尽管如此，孔子仍不得不叹道：“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又曾言曰：“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连千百年来被历代统治者尊为圣人的孔子于《易》尚且如此，其古奥艰深、奇异独特、恢宏博大由此可见一斑。

《易经》，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开启了中华文明之源，我国古代所有学问的哲学思想皆源于易学；它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宣告了中华传说时代、半信史时代的结束，标志着信史时代的开始；它自诞生之初，就以其勃勃生机，一点一点、一天一天地冲刷、改造着我们脚下这块既贫瘠又肥沃的土壤，中华民族、中国文化之所以演变成今天这副模样，似乎都可以在它身上找到文化渊源与发展轨迹；它不仅在本土，即使在欧美、日本、东南亚也有广泛的知音；它至今仍然熠熠生辉，以其独特的魅力影响着东方乃至整个世界。

二

且让我们将目光推向渺远的历史深处，以探寻《易经》的诞生与发展之源。

我们常说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那么，其源头则可追溯至公元前3000年。那破晓而出的东方文明曙光照临着的，便是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天皇、地皇、人皇谓之“三皇”，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称作“五帝”。其实，那时的华夏民族，已初步摆脱了原始的蒙昧状态，完成了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革命转变，出现了畜牧业和农业，开始安安稳稳地居住、生活在一块固定的土地上。

以我们今日的眼光而论，那时的人们仍然生活在原始的野蛮状态。殊不知，就是这道初现于华夏民族头上的一丝文明曙光——传说时代，也是人类在蒙昧的“黑暗时期”艰难地摸索了几百万年的结果。

据有关考古资料表明，大约五百万年以前，人类才由古猿开始缓慢地向原始人进化；约四百万年前，原始人诞生；约三百万年前，人类进入旧石器时代，与其他动物没有什么两样地四处流浪靠寻找、采集食物为生；约五十万年前，人类的直系祖先——直立人出现，学会了打制石器与使用火种；约一万年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成为可以进行思维、运用语言交流并能够创造文化的现代意义上的人；约五千年前，青铜时代开始，人类的文明历史这才正式拉开帷幕。

五千年与四百万年相比较，人类的文明史实在是太短暂太短暂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当我们站在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今天，实在难以想象远古人类面临的生存环境该是何等的艰难与残酷，其生存方式该是多么的野蛮与蒙昧。也许，我们只有在那些至今仍生活在荒野孤岛、深山老林里长期与世隔绝的少数原始部落中，才多少可以窥见一点早期人类的依稀身影。

“我是谁？我究竟从何处来，我又将向何处去？难道在这颗蔚蓝的星球上，在永恒的光阴逆旅中，我，只是一个匆匆过客？”当盘古开天辟地驱除了混沌与黑暗，当女娲造出一群富有灵魂的个体站立在东方辽阔的地平线，当我们的祖先第一次摘下宽大的树叶遮住赤裸的隐私部位，这一既古老又现代的疑问便一直纠缠、盘旋在具有主体意识的人类心中。在漫长的艰难生存中，他们无法理解那些神秘的自然及自然现象，以己度物，便产生了“万物有灵”的概念。莫说虎豹熊罴狼蛇鱼鸟等或奔跑或飞翔或游动的动物，就是一茎生长的野草、一棵枯死的树木、一块不动的石头也通灵性，而太阳的明晦、月亮的圆缺、狂风的长啸、雨雪的飘洒、电光的闪烁、雷霆的轰鸣则更是高高在上的神灵的某种思考与行为。既然万物有灵，那么世间万事万物总被一个高高在上的神祇所主宰，冥冥中总有一种神秘

的力量控制操纵。于是，就产生了对超自然力量与异己力量崇拜的鬼神迷信观念。人们在生产与生活实践中，一种最为强烈的心理趋向就是渴求预知未来的后果。有后果，必有前因。他们认为，后果如何，早已包孕在前因之中；反之，由前因也可推测即将到来的后果。这种前因或曰前期现象，就是古人所说的前兆、预兆及征兆。既有了鬼神迷信概念，人们就误以为前兆是鬼神呈示于人的神秘信号——一种预示、启悟或警告。后果或凶或吉，就是鬼神对人的有意惩罚或奖赏。而人们的文化心态总是趋吉避凶，当远古人类将趋吉避凶这一前兆迷信所带来的心理指归转化为外在形式时，巫术也就应运而生了。

原始宗教的形式主要就是巫术，巫术的表现方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有作法、咒术、灵符、占卜等。

巫术萌芽之初，带有原始的“天启”性质，它以蒙上了神秘色彩的种种正常多见或怪异少见的自然现象为崇尚对象。这些对象没有经过人为的加工改造，保持其自在自为的本真状态，人们在万物有灵观的“指导”下，将它们与另一些关涉人生的事物进行某种组合与对接，以前物为因、后物为果。时间一长，就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物事对接模式，积淀在人类的心灵深处代代相传。比如，人们一听见乌鸦的叫声，就断为凶兆唯恐避之不及；而一听到喜鹊的叽喳，即认为是喜事降临兴高采烈。乌鸦与喜鹊的叫声都未经改造，仅凭灵感与天启，就将与它们没有任何必然逻辑联系的凶兆与喜讯各自对接，于是，一次不需任何占卜仪式的原始巫术就这样在个体自我的心灵之中完成了。

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思维与语言的进化催生了早期的天启巫术。随着先民的进步及对自然认识的逐渐加深，人为的因素慢慢渗入巫术之中。于是，巫术在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开始慢慢向它的第二阶段过渡，增加了稍经人力改造的自然物为占卜工具，创造了简单的前兆作为卜符。而完成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代表人物就是伏羲。

据《易经·系辞下传》所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者观象于天，

俯者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也就是说，是伏羲氏（即包牺氏）在占卜的过程中，从天地自然中得到启发，从而发明创造了八卦。

伏羲，是远古人类由诚惶诚恐地仰视上天而面对自身的一个转折性标志。他是传说中的人类始祖，是女娲氏兄妹相婚的结晶。他娴熟于原始的生产与生活技能，教人结网从事渔猎，又教人驯养动物从事畜牧。他是人们心目中的一具神灵，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人，是一位神格化了的人。由伏羲身世与传说所透露出来的文化信息说明，长期匍匐在地的人类抬起了头颅挺直了腰身，自尊与自信开始在先民们心中涌动弥漫，“人”字第一次变成了大写。

据《洪洞县志》记载，伏羲演八卦之所在就在该县的卦底村，村中现存伏羲庙伏羲冢，村中设有画卦台。以卦底村为中心，周围又有八村环绕，距卦底村均为八里，呈太极图状，分别代表八卦中的乾坎震巽离坤兑艮，依次标志着天水雷风火地泽山。

除此而外，全国存有伏羲庙、伏羲墓的地方尚有多处，都标明、竞争着伏羲创造八卦的发明权。但我以为最值得可信的是位于河南巩义市沙漁沟乡洛口村的伏羲八卦台。一条深沟的底端，筑着一块高约两丈、面积约两亩的圆形土坛，土坛北对黄河与洛河的交汇处，南依莲花山。当年，伏羲极有可能就是静静地坐卧在这一土坛之上，背倚高山，俯视大地。“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而洛河，也因了一冬一春的积蓄，将一湾激流注入黄河以助其势。黄河浑浊，洛水清亮，一黑一白，泾渭分明。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黄河与洛水相互激荡，清浊交汇，黑白分明，形成一股巨大的漩涡，翻滚着漫向遥远的天际。伏羲定定地望着，心中突然一亮，掠过一道灵感的闪电：一清一浊，一黑一白，一阴一阳，相互包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不是一幅包蕴着天地万物的奇妙图画又是什么？于是，伏羲心潮起伏，一如黄洛之水汹涌澎湃，情不自持地信手一画，就有了我们今天见到的阴阳太极图。黑者阴，阴为虚，用符号表